

# AIGC 时代纪录片创作的“集置”困境与真实性重构

汪萌<sup>1</sup>

(1.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 AIGC 技术的爆发式迭代推动纪录片创作进入“人机协同、虚实交融”的全新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以海德格尔技术批判哲学为理论视角,系统审视 AIGC 技术与纪录片创作的深层耦合关系,指出 AIGC 的技术本质契合海德格尔所提出的“集置”(Ge-stell)存在方式,以促逼性逻辑将世间万物转化为可供计算、调度与使用的“持存物”(Bestand),进而引发纪录片真实性的三重解构,即影像“索引性”关联断裂导致拟真与现实脱节、创作主体性被技术逻辑深度异化、人本伦理失衡催生责任真空,使纪录片创作陷入技术支配的哲学困境。AIGC 作为新一代数字媒介形态,呈现出媒介工具特有的内在悖论,进一步加剧纪录片的真实性危机。本文结合国内外具体创作实践案例,采用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辨相结合的方法,以海德格尔“诗性思维”为核心指引,从技术工具性辩证回归、诗性表达对抗、伦理规范建构与人文价值重塑四个维度,探索数字时代纪录片真实性的重构路径,为技术赋能下非虚构影像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AIGC; 纪录片; 海德格尔; 真实性

## The "Gestell" Dilemma and Reconfiguration of Authenticity in Documentary Production during the AIGC Era

Wang Meng

(1.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e explosive iteration of AIGC technologi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ropelled documentary production into a new developmental phase characterized by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the fusion of virtual and real dimension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adopts Heidegger's cri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deep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IGC technologies and documentary production; it argues that the technical essence of AIGC aligns with Heidegger's concept of the "Gestell" (Gestell), which transforms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into "Bestände" (existing entities) that can be computed, scheduled, and utilized through a coercive logic; this process triggers a tripartite deconstruction of documentary authenticity: namely, the disruption of the "indexical" correlations within imagery leads to a

**作者简介:** 汪萌, 西北师范大学中外写作中心特约评论员。

disconnection between simulation and reality; the creative subjectivity is profoundly alienated by the technological logic; and an imbalance in human-centered ethics gives rise to a vacuum of responsibility, thereby plunging documentary production into a philosophical dilemma dominated by technology. As a new generation of digital media forms, AIGC exhibits inherent paradoxes characteristic of media tools, further exacerbating the crisis of authenticity in documentaries. Drawing upon specific creative practice cases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s, this paper employs a methodology combining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theoretical reflection, guided by Heidegger's notion of "poetic thinking," to explore pathways for reconfiguring documentary authenticity across four dimensions: the dialectical return to the instrumental nature of technology, the confrontation with poetic expres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norms, and the reshaping of humanistic values; ultimately,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on-fiction visual work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Keywords]** AIGC; Documentary; Heidegger; Authenticity

## 前言

纪录片自诞生起便以“真实性”为不可动摇的核心本质属性，其百年发展史本质上是技术不断复现事实真实的演进史。19 世纪末，法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推动机械摄影技术走向成熟，卢米埃尔兄弟将摄影机转化为观察现代社会的直观工具，《工厂大门》中劳工下班的自然动态、《火车进站》里人群的真实反应，以未经修饰的原始影像奠定了纪录片“记录现实”的本体属性<sup>[1]</sup>。这一时期的真实性依托于摄影机对客观场景的直接捕捉，形成“所见即所得”的朴素认知，其本质在“记录现实”的具体实践中自然显现，契合海德格尔对技术工具性的原始界定：技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人类的一种活动<sup>[2]</sup>。这表明技术是向现实的回归，是一种解蔽方式，是通过影像记录融入揭示现实世界意义的活动<sup>[3]</sup>。

20 世纪以来，纪录片真实性理念随技术发展持续革新，形成多元并存的创作思潮与美学范式。弗拉哈迪在《北方的纳努克》中，以“非虚构重现”手段参与人类学实地观察，开启对真实的创造性呈现；格里尔逊在《漂网渔船》中明确提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试图构建纪录片兼顾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理论框架，确立非虚构影像的社会教化功能与公共价值；罗伯特·德鲁、理查德·利科克等人提出“直接电影”理念，强调追求“墙上的苍蝇”式客观观察，以长镜头、同期声捕捉生活本貌，排斥一切可能破坏生活原生态的主观介入；琳达·威廉姆斯提出“新纪录电影”观点，主张采用一切虚构手段揭示深层真实，聚焦公共机构与社会议题，彰显社会批判使命，形成“记录的真实”与“真实的记录”相统一的核心准则。这一脉络与克拉考尔“物质现实复理论”中“记录功能”与“揭示功能”的二分逻辑高度契合：新纪录电影虽以“新虚构”突破传统纪录片的形式框架，却始终未脱离对现实的根本依托，继承“记

录功能”以客观现实为题材，强化“揭示功能”以虚构与故事化挖掘深层真实，最终实现二者平衡，完成对“物质现实”的完整复原。这种内在契合性表明，即便在“多重化”“碎片化”特征显著的后现代语境下，纪录片对“复现现实”的核心诉求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国内早期纪录片以典型场景选取、集体主义符号呈现构建核心议题，表达手法以“摆拍+解说”为核心，镜头语言服务于明确的宣传教育目的。进入 80 年代，中国纪录片形式实现从“工具性”到“艺术性”的关键跨越。戴维宇在编导《话说长江》中突破单一宣教框架，以“地理空间叙事”为核心，将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民俗文化与历史变迁有机融合；刘效礼任总导演的《望长城》则实现里程碑式突破，首次大规模引入同期声、长镜头、跟拍等纪实手法，捕捉考古现场的真实进程、普通民众的自然反应，形成“原生态记录”的鲜明特征，标志着中国纪录片对“纪实美学”的正式探索。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今，纪录片形式进入多元融合的成熟阶段，创作边界持续拓展。秦博在《人间世》《人生第一次》延续“记录电影”理念，聚焦个体命运与社会公共议题，实现“原生态现实呈现”；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成为跨界创新的典型代表，突破传统纪录片与剧情片的边界，采用“真实访谈+演员演绎”的混合形式，影片以成都国营工厂的变迁为核心，记录八位真实工人的口述历史，同时邀请演员扮演不同时代的工厂职工，通过虚构场景还原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细节。这种形式创新的核心逻辑，是“记录真实”与“演绎真实”的有机统一——真实访谈保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演员演绎则弥补历史场景的影像缺失，二者共同服务于“工业文明转型中的个体命运”这一核心主题，为纪录片的真实性表达提供全新可能。

二十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以“阶梯式迭代”推动纪录片迈入虚实交映的新阶段。从早期数字摄像机取代胶片设备，实现拍摄轻量化与素材存储数字化，到 4K/8K 超高清技术、高动态范围（HDR）成像突破视觉还原极限，再到无人机航拍、水下摄影、显微镜头等特种拍摄设备拓展空间捕捉维度，技术早已为纪录片的“真实呈现”提供多元可能。进入新世纪后，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技术的成熟彻底打破传统视听边界：VR 的沉浸式全景叙事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使创作者能在虚拟搭建的历史场景中完成拍摄调度，模糊现实取景与虚拟建构的界限。

真正的革命性跨越来自 AIGC 技术的爆发式迭代：从 ChatGPT 的文本生成辅助脚本创作、梳理采访逻辑，到 Midjourney 的图像创作还原已消失的历史场景，再到 Sora 的视频生成实现“无实景拍摄”的动态影像创作，AIGC 完成从“辅助工具”到“协同生成”的质变。这一过程中，技术革新的核心逻辑从“提升记录效率”“优化呈现效果”转向“主动参与叙事建构”。早期数字技术是延伸人类感官的工具，而 AIGC 已成为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基础存在论背景”，不再被动执行拍摄或剪辑指令，而是通过算法对海量数据的整合分析，主动参与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和诠释。当纪录片需要还原未被记录的历史瞬间，AIGC 可基于史料生成“拟真”动态影像；当需要填补现实场景的信息空白，算法能通过逻辑推演补充完整叙事链条，技术革新至此彻底改写纪录片依赖实景记录的传统创作范式。

这些技术实践固然极大拓展纪录片的表达边界——超高清技术让细节真实触手可及，VR/AR/MR 打破

时空限制，AIGC 解决“无法记录”“难以还原”的创作困境——却也将其推入海德格尔警示的“集置”支配逻辑。技术不再仅仅是服务于人类认知的手段：数字技术让拍摄者对“极致真实”的追求逐渐转向“技术可实现的真实”，而 AIGC 的崛起更让人类开始依赖算法生成“拟真”内容，以填补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空白。当 Sora 能仅凭文本指令生成与真实场景无异的战争、灾难影像，当 Midjourney 重构的历史人物表情、动作足以以假乱真，当算法可整合碎片化信息生成完整的“纪实叙事”，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拟真能力”已突破创作辅助的范畴，成为重构“真实”的核心力量。

此时，纪录片的本质面临前所未有的拷问：当数字技术的超高清还原、VR 的沉浸式体验、AIGC 的拟真生成，让“虚构”与“纪实”在感官层面难以区分，纪录片与虚构作品的界限如何界定？当“他者”（AI）借助技术革新的红利，深度参与叙事建构、场景还原、内容生成等核心环节，甚至能独立完成看似纪实的影像创作，人类创作者的主体性如何保障？这些由技术革新直接催生的问题，使纪录片赖以生存的“真实性”面临自其诞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技术本应是真实的“放大器”，却在迭代中逐渐成为“真实”的“重构者”，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二十世纪以来数字技术从“工具赋能”到“逻辑支配”的持续演进。

## 一、AIGC 时代纪录片的“集置”困境：技术逻辑对真实性的三重解构

### （一）真实性危机：从“索引性”到“技术支配下的拟真”断裂

传统纪录片的真实性，建立在影像与现实的“索引性”关联之上，本质上依赖直接索引符号与现实世界的物理性关联。这一逻辑源于皮尔斯符号学中的“纯索引符”概念，即符号通过与对象的物理接触而产生，其存在直接由对象影响和决定<sup>[4]</sup>。巴赞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中指出，胶片摄影通过光成像过程，直接记录现实物体的光影投射，形成与拍摄对象的规律性联系<sup>[5]</sup>。索引符号借助与对象的联系成立，能为纪录片事实提供证据，因此具备天然的证据属性。观众对纪录片的信任，本质上是对这种“索引关联”的潜意识认同——即便影像经过剪辑，仍会将其视为现实的延伸<sup>[6]</sup>。

AIGC 技术彻底打破这种“索引性”关联，其背后正是“集置”的支配逻辑：技术成为重构现实的核心力量，人类依赖算法生成“拟真”内容以填补认知空白。CuriousRefuge 团队制作的《泽布隆五号星球》AI 自然纪录片概念短片，用 Midjourney 生成外星景观、RunwayML 生成动态画面、Elevenlabs 合成旁白，全片无任何实拍素材，却呈现高度写实效果，符号已经完全抽象化，不再具有能够索引具体对象的功能；《山海经》系列纪录片依据古代文献，通过 AIGC 生成奇珍异兽与神秘国度，视觉逼真却无客观对应物。这些虚拟真实场景虽具备视觉说服力，却缺乏与客观世界的物理关联，本质是技术按自身秩序构建的“拟真”，而非对现实的记录——这正是“集置”的核心特征：世界按技术逻辑被规整、支配，真实沦为技术的附属品。

这种转变导致双重认知困境：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纪录片情景再现、动画等手段，仍由人类主导叙事与考据，属于“对真实的阐释”。而 AIGC 创作以算法自主生成、数据驱动替代人类判断，将现实转化为可计算的持存物，这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集置的促逼，因此构成对纪录片真实性的本质性冲击，而非形式创新。观众难以通过视觉分辨影像来源是现实记录还是 AI 生成，感官信任基础崩塌；另一方面，A

IGC 的“拟真世界”模糊虚拟与真实的界限，使纪录片的真实性从“对现实的反映”异化为“人工智能模拟的产物”。

## （二）创作主体性消解：从“作者意图”到“技术附庸”异化

传统纪录片创作中，人类创作者始终居于主体地位，“作者意图”是作品思想深度与艺术个性的核心来源。从《舌尖上的中国》对“人间烟火气”的诗意诠释，到《最后的棒棒》对重庆棒棒军群体的人文关怀，创作者通过选题筛选、镜头调度、剪辑节奏把控，将个人价值判断与社会思考融入作品，形成鲜明的“作者性”。即便如《河西走廊》大量运用情景再现，仍以人类对历史的理解为核心，通过严谨考据与艺术呈现，传递历史的厚重感与人文温度。然而，“集置”的支配逻辑，使创作主体性呈现“去中心化”趋势，技术不再是创作者的工具，而成为支配创作流程的主体。人被算法、数据与工具理性裹挟，不再倾听存在、不再守护真理，彻底落入非本真的生存困境。海德格尔曾警示，“集置”会使人类丧失对存在的独立思考，将技术视为所有问题的答案，这一警示在 AIGC 纪录片创作中尤为显著。

思想的异化意味着人放弃对存在真理的追问，转而服从技术逻辑。在 AIGC 创作流程中，创作者从“现实的观察者与诠释者”，逐渐转变为“技术的操控者与数据的筛选者”。当《偷窃你的感情》通过 AI 捕捉观众面部表情并动态调整叙事，或《伊诺》利用算法实时重组 500 小时素材生成“千人千面”的版本时，纪录片的真实性已从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异化为对技术秩序的服从，观众的“在世”体验被技术框架所规训，感知、情感和思考方式逐渐被技术逻辑深度塑造<sup>[7][8]</sup>。AI 脚本生成工具通过分析海量纪录片文本，自动构建符合市场逻辑的故事框架；AI 绘画工具根据关键词生成标准化场景影像；AI 音频平台模拟特定人声进行配音，如《创新中国》对李易声音的复刻。创作过程简化为固定算法逻辑下的模块式流程，创作者的个人风格与思想意图被“集置”为大数据算法的标准化输出。算法的“黑箱特性”进一步加剧这种异化：AI 生成内容的算法逻辑不透明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创作者难以完全理解其运作机制。在《文化中国行 | 微观视角下的赣文化第一季》中，从画面生成到旁白撰写均依赖 AIGC 完成，观众无法从成片中识别出独特的艺术加工痕迹，“作者性”被模糊的人机协作所取代。当创作者依赖 AI 完成核心创作环节，其对现实的感知力与思考力逐渐退化，最终沦为技术的“执行者”而非“创造者”，这正是“集置”对人类主体性的根本消解——人类不再是意义的赋予者，而是技术系统中的被动要素<sup>[9]</sup>。

## （三）伦理责任失衡：从“人本主义”到“伦理真空”

传统纪录片创作遵循“人本伦理”核心准则，以尊重人类价值为前提，明确界定伦理责任边界。<sup>[10]</sup>《生门》直面产科病房的生死抉择，以克制的镜头语言保护患者隐私，传递对生命的敬畏；《欢迎来到车臣》为保护 LGBTQ 群体幸存者，首次大规模使用 Deepfake 技术替换面部影像，在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间实现平衡。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角下，技术不仅仅是工具，而是一种揭示世界的根本方式，它塑造我们对存在本身的理解。然而，当技术的“集置”逻辑占据主导地位时，伦理维度往往被遮蔽或边缘化，形成“责任真空”，技术成为支配伦理判断的核心。

AIGC 技术的应用催生“数据伦理”新问题，其工具性悖论在此尤为突出：一方面，AIGC 在“集置”中脱离单纯的工具属性，成为伦理判断的隐性框架；另一方面，其本质的工具性又使其缺乏内在的伦理约束，形成“责任真空”。<sup>[11]</sup>首先，数据采集边界模糊：AI 生成内容需依赖海量训练数据，这些数据可

能包含未授权的个人信息、受版权保护的影像素材，存在隐私泄露与版权侵权风险，这正是技术工具性被滥用的直接后果。其次，算法黑箱导致责任认定困难：当AI生成内容出现事实错误、价值导向偏差或侵权问题时，难以界定是数据问题、算法缺陷还是人类操作失误，传统伦理责任体系在此完全失衡。最后，技术滥用风险加剧，Deepfake等技术可伪造人物言行，可能被用于虚假宣传、舆论操纵，严重违背纪录片的真实性伦理。

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系统阐释虚拟符号对现实的颠覆：当虚拟符号、拟像对现实的复刻达到极致，甚至超越现实本身的“真实性”，人们无法区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最终更倾向于相信和依赖虚拟构建的“真实”，使虚拟反而比现实更具吸引力。这种伦理失衡本质是“集置”逻辑的产物——AIGC技术将人类、历史、文化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资源，忽视数据背后的人文价值与伦理边界。当纪录片创作以“极致效率”“视觉奇观”为首要目标，其作为“人本精神”载体的本质属性便会被遮蔽，这与新媒介工具性悖论的核心困境高度契合：技术越是脱离表层工具性，其本质工具性带来的风险就越是隐蔽且致命。

## 二、突破“集置”：AIGC时代纪录片真实性的重构路径

### （一）技术工具性辩证回归：以人文目标引领技术应用

海德格尔主张，技术的本质应是“解蔽”真理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结合新媒介的工具性悖论，AIGC的合理应用需实现工具性的辩证回归：既要承认其在“集置”中脱离表层工具性的现实，又要牢牢把握其本质工具性，使其服务于纪录片“记录真实、揭示本质”的核心使命。创作者需在生成历史题材内容前，全面比对多源文献、实物证据，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史料交叉验证；引入行业专家对AI生成的关键场景、人物对话进行评议审核，确保内容符合历史真实与事实逻辑。《中国官箴》在运用AIGC复原宋代场景时，严格依据宋代服饰规制、器物形制、建筑法式，每一处细节均有史料支撑，使虚拟影像成为“历史解蔽”的工具，而非单纯的视觉装饰。这种“技术服务人文”的逻辑，既尊重AIGC作为高阶技术的本质特征，又通过人文目标的引领，避免技术异化，让AIGC成为拓展真实性边界的助力，而非消解真实性的阻力——这正是对工具性悖论的辩证回应。

技术回归的核心是确立“人类主导、AI辅助”的创作秩序。AIGC时代的纪录片创作尚未受到行业性的算力竞争影响，当前纪实创作仍以实拍为主体，AIGC多用于脚本撰写、素材整理、后期包装等轻量化辅助环节，对算力依赖有限，难以形成以算力投入论优劣的行业生态。加之云端算力与在线生成工具高度普及，中小团队均可低成本获取技术支持，不必在硬件与算力层面展开军备竞赛。仅在依托大规模虚拟场景复原、8K超高清呈现、VR沉浸式交互的头部项目中，存在局部算力投入差异。这类作品因高精度建模、实时渲染与多模态数据融合需求，对算力支撑提出更高要求，但仅属于特定题材与实验性创作的阶段性现象，并不代表行业主流趋势。纪录片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真实品格、人文价值与创作主体性，而非算力规模<sup>[12]</sup>。

将AI定位为提升效率、拓展可能的工具，而非替代思考、替代创作的主体。在脚本创作中，AI可提供资料梳理、结构建议，但核心立意、价值判断、情感温度必须由人类完成；在影像生成中，AI可还原无法实拍的场景，但细节考据、美学风格、叙事意图必须由人类把控；在剪辑包装中，AI可实现素材

筛选、节奏匹配，但叙事逻辑、情感节奏、思想表达必须由人类主导。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技术逻辑对创作的全面支配，让技术回归“为人服务”的本初定位。

## （二）诗性表达对抗：在算法框架中开辟“林中空地”

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林中空地，是存在自行敞开的本源境域，也是现象得以显现的根本条件。它并非纯粹光明，而是在遮蔽中敞开、在敞开中遮蔽的存在论真理发生之地。人作为此在，便立身于林中空地之中，成为存在的守护者与倾听者。在 AIGC 带来的“集置”困境下，林中空地更具有关键意义，它为被算法规训、被技术同质化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抵御技术支配、回归诗性与人文本真的思想空间，是重建真实性与主体性的存在论根基<sup>[13]</sup>。

海德格尔将“诗性思维”视为人类抵抗“集置”支配的有效路径。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中，海德格尔直言：“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Dichtung）”，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力量，赋予每个人以个体层面抵抗技术支配的能力。“集置”的核心危害，是将创作过程标准化、同质化，使作品丧失艺术个性与人文深度。突破这一困境，需以“诗性表达”对抗技术理性的束缚，在算法框架中开辟充满创造性的“林中空地”——通过艺术构思赋予 AI 生成内容以灵魂，实现“技术理性”与“诗性思维”的融合，激活观众的“在世”体验。《飞来峰》的创作实践提供有益借鉴，面对无法常规拍摄的残破石窟场景，创作团队运用数字化模型构建虚拟空间，通过时光流转实现古今场景自然切换，将技术限制转化为艺术创新；对于残破的卢舍那造像，并未追求完全写实的复原，而是借助 AIGC 技术使面容于斑驳光影间呈现若隐若现之态，为作品赋予诗意的想象空间。这种创作方式，打破 AI 生成内容的刻板性，使纪录片超越“记录工具”的属性，升华为富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诗性表达还可通过叙事创新实现：

《金陵念》将 AIGC 生成的六朝建康城虚拟场景<sup>[14]</sup>，与现实中南京城的航拍镜头交替呈现，虚拟宫阙与现代建筑遥相呼应，让“过去”与“当下”展开对话，激发观众对城市文脉延续性的思考。这种“虚实辩证”的叙事，使 AI 生成内容与现实影像相互印证，共同构建更丰富、更立体的真实性维度，观众在这种辩证关系中，得以突破技术框架的规训，获得更深刻的“在世”体验与意义感知。

诗性表达的根本，是以人文意蕴抵御算法带来的同质化。创作者在技术生成的影像之上，注入情感、思想、审美与价值立场，让作品不只停留在视觉逼真，更抵达情感真诚；不只满足视听呈现，更拥有精神内核。诗性思维使纪录片从信息传递的载体，升华为意义建构的载体，在技术浪潮中守住艺术个性与人文本色。由此，AIGC 时代纪录片的真实，不再是“实拍即真实”的单一标准，而是以人为主导、可核验、可阐释、有伦理根基的多元真实。

## （三）伦理规范建构：建立透明化与人机协同审核机制

突破“集置”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完善的伦理规范体系，将技术纳入人文价值的规约之下，回应工具性悖论带来的伦理风险。比尔·科瓦齐和汤姆·罗森斯蒂尔提出的透明性原则，适用边界已从传统新闻拓展至更广泛的非虚构内容创作领域。强制要求创作者对 AIGC 生成内容与数据来源进行明确标注，如在画面角落或片尾注明“此场景由 AI 基于《宋史》《营造法式》等文献生成”，公开关键数据的出处与授权信息。这种透明化不仅尊重观众的知情权，更能引导观众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思考”，理解技术背后的叙事意图与人类主导性。

行业层面需及时建立全流程人机协同审核机制，制定AIGC技术应用白皮书，明确使用场景与边界，通过“生成日志”记录AI决策过程，避免黑箱风险，将AIGC使用情况纳入影片注释体系，接受行业与公众监督。这一机制通过人类主导的伦理把控，为AIGC的工具性应用划定边界，防范技术滥用。通过行业协会制定明确的真实性标准、数据采集规范、责任划分规则；鼓励技术研发机构将伦理准则内置到AI工具中，如开发“AI生成内容自动标记系统”“虚假内容识别算法”，从技术源头防范伦理风险。这种多层次的伦理规范体系，既承认AIGC的技术特性，又通过人文价值的嵌入，实现技术与伦理的平衡。

伦理规范的核心是“可追溯、可核查、可问责”：让每一段AI生成的纪实影像都有来源、有依据、有审核，让每一次技术应用都有边界、有约束、有责任。唯有建立严肃的伦理框架，才能防止AIGC成为消解真实、制造虚假的工具，守护纪录片的伦理底线。

#### （四）人文价值重塑：回归对人性与历史的深度追问

纪录片的核心使命，在AIGC时代依然不可动摇。在AIGC主导的创作流程中，历史场景、人物情感、社会现实不再被视为需要敬畏、倾听与深度阐释的存在本身，而是被拆解为像素、文本、音频等可计算、可调度、可重组的数据要素。创作者也逐渐放弃对“真实本质”的追问，转而追逐“如何用技术生成更逼真的视觉拟真”。正因如此，突破“集置”困境的根本路径，在于重塑人文价值，将“以人为本”贯穿创作全程：以人文精神引领算法决策，借助AIGC挖掘历史背后的人性温度，呈现现实深处的精神内核，以此重建被技术遮蔽的“本体论背景”下的主体性。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技术的“解蔽”最终应当服务于存在真理的显现，而人文价值，正是这一真理的核心内涵。在历史题材创作中，避免将历史简化为视觉奇观，而是通过AIGC技术还原“人的故事”。《AI·爸爸》将已故父亲的数字影像与家庭录像融合，构建承载亲情记忆的真实性，证明AIGC可成为人文价值的新载体。在社会题材创作中，利用AI技术捕捉被忽视的社会议题，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分析社交媒体数据识别特殊群体诉求，以虚拟影像呈现难以直接拍摄的生活场景，推动社会共识形成。在文化题材创作中，借助AIGC激活传统文化资源，让古籍、文物、非遗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当代生活，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与精神价值，避免技术对文化的碎片化、娱乐化消解<sup>[15]</sup>。

人文价值重塑的关键是回归“人”本身：关注人的生存、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价值，让技术服务于人的表达、人的理解、人的沟通。无论技术如何迭代，纪录片的最终目的永远是记录人、理解人、温暖人、启迪人。唯有守住这一核心，才能在AIGC时代始终保持纪录片的精神高度与人文底色。

### 三、结语

AIGC技术的兴起，将纪录片创作推向“虚实交融、人机协同”的新阶段。它既极大拓展纪录片的表达边界与传播能力，也使其陷入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双重困境——“集置”对真实性、主体性与伦理的三重解构，以及新媒介特有的工具性悖论。然而，技术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困境的本质是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压制，突破困境的关键在于确立人类的主导地位，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正是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给当代纪录片创作的核心启示。

通过技术工具性的辩证回归，可使AIGC服务于真实性构建。通过诗性表达的对抗，能在算法框架中保留艺术个性与“在世”体验；通过伦理规范的建构，可防范技术滥用风险；通过人文价值的重塑，能

让纪录片回归记录与思考的核心使命。四条路径相互支撑、有机融合，共同构建 AIGC 时代纪录片真实性的新坐标系——真实性不再是机械的客观复制，而是“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技术真实与人文真实”“在世体验与意义建构”的多元统一。

未来的纪录片创作，将走向“人本智能”的协同范式。通过借鉴人脑的神经结构、认知机制与信息处理方式，实现低功耗、高泛化、强理解的通用智能。从这一意义而言，AIGC 的长远未来与脑机融合、认知智能深度绑定，技术最终将回归“以人为中心”的底层逻辑。与之相应，纪录片创作的路径同样无法脱离人的“本性”。无论 AI 生成能力如何迭代，纪录片的真实性、价值立场、叙事温度与人文关怀，均由人的主体性决定；技术可以拓展表达边界，却无法替代创作者对现实的观察、对人性的洞察、对历史的思考。因此，AIGC 时代的纪录片创作，必须坚持技术为用、人文为本，在人机协同中守住以人为核心的创作伦理与精神内核。人类以人文精神为指引，掌控创作方向与核心价值；AI 发挥数据处理、场景生成、互动传播的优势，成为拓展认知边界的高效工具。在这一范式下，纪录片将突破“集置”的遮蔽，既充分利用技术照亮更广阔、更细微的真实，又始终坚守人文精神的底线，继续作为“时代之镜”与“文明之窗”，记录人类的历史与当下，启迪对世界本质、存在意义的永恒追问。而这，正是对海德格尔“技术解蔽存在真理”命题的最佳回应——AIGC 最终应成为人类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友好工具，而非支配存在的无形枷锁。

### 【参考文献】

- [1]ZHANG Y, LIU Y. When the False Becomes Real: Reflections on How AIGC ‘Generative’ Documentary Creation ‘Anchors Realit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Research,2025,8(9):53-57.
- [2]HEIDEGGER M.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M]. LOVITT W, tran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77: 3-35.
- [3]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8-40.
- [4]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8-52.
- [5]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 [M]. 崔君衍,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3-19.
- [6]王迟.“索引性”概念的还原[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4(5):43-51.
- [7]BORGS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38-52.
- [8]IHDE D.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68-85.
- [9]张力.网生代纪录片的传播特征与创作趋势[J].视听界,2024(03):34-39.
- [10]GILCHRIST. Article Title[J]. 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 2015, 14(3): 237-255.
- [11] ILHARCO F. The backgroundness of new media: A phenomenological accou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J]. Empedocles: European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2015, 6 (1): 39-55.
- [12]国家广电智库.「一线观察」第二届中国(吉林)真实影像大会:见证北国江城中的真实回响与生态新变[EB/OL].20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53926331379885133&wfr=spider&for=pc>.
- [13]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3-36.
- [14]南京报业传媒集团.金陵念·长干古城[Z].2024.
- [15]张蓝姍,唐慧婷.AIGC:媒介内容创作的新变革[J].中国电视,2023(5):94-100.